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徐梵澄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徐梵澄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

ISBN 7-5004-3208-9

I. 徐… II. 中… III. ①徐梵澄(1909~2000) -
文集②宗教文化 - 文集 IV. B9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914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郭娟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ass.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16 千字

印数 1 - 2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为徐梵澄先生编这部《集》，责无旁贷。然而要编辑者说话，却颇感不安。这好比一袋子的精金美玉被掺和进了杂质。但是，有关梵澄先生的身前身后事，有些是要向读者尤其是喜爱他的读者交待的，否则，行事无所端由，接下来的步子会迈得不够顺畅。

去年，己卯年，时值梵澄先生九十岁高龄，也是他从印度回国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年初，卓新平所长就与我商量，是否为先生举办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我因知道先生不喜张扬的个性，故面有难色。新平又说：不然，我们同他一道吃顿便饭，以表达一下我们的祝福。后来，我登门拜访，传达了卓所长的想法。对于开会的意见，先生说：“不必了。”对于便宴的请求，先生说：“近来身体不适，以后再说吧。”我未坚持，也无由坚持。

当时的造访还谈及了两件事，一是出版《文集》，二是编辑这部《集》。两事需分别来说。

先说《文集》之事。也是年初，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就动议为徐先生出版全集，并委托我征求一下先生的意见。先生的回答是：“可以考虑……待几本未出的书出齐以后，写一小结

或序文，封笔了。”我还问：“是否所有的文字呢？如诗集和过去的杂文。”他说：“那倒不必了，多出少出无大妨碍。”后来我说，那就叫“文集”，可多可少，选择自由。他以为可以。他告诉我，除了翻译之外，他的写作，英语文章多于文言文，文言文多于白话文章，比如《异学杂著》就有文言部分，结果让编辑给“割舍”了。他说：文言与白话未并出，也不错，不然如一人身着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

再说本《集》之事。3月份，科研局根据李铁映院长和院务会议关于编辑出版我院老专家文选的指示，颁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的通知》。张新鹰副所长嘱我与先生商量，并请求他自辑文选，他在原则上也同意了。但鉴于当时编选与出版的一些具体要求不够明确，所以，先生请我再作进一步咨询。咨询，暂无下文，因为当时全院的工作安排有一很大的调整。待文选工作重新启动之时，已近年底，先生的健康状况也进一步恶化了。关于编辑文选，先生是这么说的：我自己的文字不多，主要都在序、跋里了（我理解主要是集中反映先生思想、观点的文字）。我们还达成了—个共识，即文选取材主要选择先生后期（回国以后）的文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先生的序、跋集为一编的缘故。

于《文集》，先生身前有所交待。我们在检索先生遗物时，由邻居好友詹志芳先生理出，其为6页16开纸之手迹，篇无先后，有“译自英文者”、“译自德文者”、“译自法文者”、“译自梵文者”、“译自华文者”（英文）、自著（英文）、自著（华文），凡27种37册（有的译著显然是略去了）。这里不妨请问一个问题：先生通晓几种外国语言呢？除以上四种外，还有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为哲学翻译所必需。另外，先生多年生活在印度，不能不懂印地语；他研究佛经，有时也要参考日本学者的成果。还有，

我听说他在印度学习过阿拉伯文，但未见及使用，不提。

于本《集》，先生未尝留言。我想，这原因是当时他可能有感体力不支，时间无多了，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即加快《摄真言义释》的翻译进度。为此，他要我借出大藏经密教部若干册和线装本的《本草纲目》。记得去年入冬后的一个下午，天色将晚，我把书送到，又陪他上街理发。那时，他刚出院不久，身体明显虚弱，但精神还好，缓行在便道上，他谈起了《圣经》的翻译，说是需要不同文字和版本的比勘。后来，我搀扶他上楼，入门，落座，他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借到了书，二是理了个发，好了，可以工作了——”

没想到，这竟是我在先生家与他对坐晤谈的最后一次。

年底，我奉人事局之命赴井冈山地区洽接我院在当地挂职锻炼的博士生。回京以后，才得知先生再次住院，而且病情严重。先生无后，一生独身，其时先生在长沙的侄子（先生三哥之子）徐硕朋先生和在昆明的侄孙辈（先生长兄之后）还未到京，所以，第一次为先生抽（排）（积）液，是由我代表单位签的字。积液排出以后，先生好了许多。一天，我陪新平所长去看望他，他倚窗而坐，与我们攀谈，他说到了鲁迅，说到了中印社会的不同……有一句话，犹如电光击闪，刹那洞明新境，至今在我脑海里鲜活不磨，他说：“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于此可窥先生精神指归了。先生少（年）学西文，中年又治印度古典，晚年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精神的故乡。故，本《集》以《陆王学述》殿后。其终点，亦是其起点。先生早说过的，精神的进步，是螺旋式地上升，譬如一蛇盘旋，首终衔其尾。要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即使充满无尽的艰辛与悲怆！

不幸，在处理先生后事的过程中，有一段我们无法控制且无

可奈何的“混乱”，先生未完成的手稿《佛教密宗——摄真言义释》遽然不翼而飞，同时缺失的还有先生的部分书籍和先生借阅贺麟先生的一些藏书。事发当天，徐硕朋先生急呼我和同事李毓凤、李华民迅至先生家，同到的还有蒙登进、冯姚平、姚锡佩、姜丽蓉、詹志芳诸先生。经过共同的清点，发现不见的还有先生的旧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日记及全部印章。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特别是手稿的失落，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因为，它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国宗教神秘主义研究领域中，有一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将继续荒芜下去。于此，后人难以为继，也无能为继。

财产可有天价，精神的财富却无价。这道理，在以上诸先生是深明于胸的，他（她）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联系，但所得答案都是令人沮丧的。怎么办？似乎只有一条路——继续努力，我们也只能相信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是什么？依儒家义，天是天理，在人，就是良心。而良心的开显，端在自启。

一般学术界多以为先生是一个大翻译家，且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小学”领域功力深湛，其实，先生的学思企向是在精神哲学的领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锲而不舍的，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跋旧作版画》）这一点，我相信读者会从本《集》的解读中有所“自得”。先生指出，精神哲学是研究心灵或性灵的学问，其主旨和目的在于变化人的精神气质，并“终期转化人生与社会”。诚如康德之教诫：人之为人，“应该”并“可能”变自然链条为自由律则。先生举示——“使人类进步的最好办法，是自己前进。”（室利阿罗频多语）此乃先生精神哲学之箴言。

末了，续赘言。

在《文集》整理与计划出版工作之始，任继愈先生就应允为之作序。任先生就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曾予梵澄先生的工作与生活的多方关照。对于先生的后事安排，他也给予了特别的关心。

有关先生后事处理和作品出版的组织与规划，卓新平所长、曹中建副所长和张新鹰副所长都有原则性的指导和具体的参与。此外，我们还得到徐硕朋先生、蒙登进先生、冯姚平先生、姚锡佩先生、姜丽蓉先生和詹志芳先生的有力支持；还有，这部书稿是由郁立女士录入的，她的做事态度与效果，无可挑剔。以上，不致深谢，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鉴于本《集》的编选要求和编排体例，先生一些精彩的文章未被收入，如《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超人论衍》、《专史、新研、极成》等；另外，因章页的限制，也未取先生的《老子臆解》，他曾抱怨此书出版以后未遇批评文章。这些遗憾只得留给《文集》出版时再作补救了。关于《文集》，倪为国先生还要我编写一本《徐梵澄先生学思年谱》，与《文集》诸本并出。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别无选择，只当全力以赴，因为，在我看来，这桩事情的意义深重而且长远。但是，由于我学力微浅，所做只能是一个开头。果能入先生这一系精神哲学之堂奥者，尚俟来人！

孙波

2000年11月30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文 论 篇

希腊古典重温	(3)
澄庐文议	(29)
谈“书”	(101)
略说“杂文”和《野草》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作	(122)
蓬屋说诗	(135)

序 跋 篇

《玄理参同》序	(167)
《五十奥义书》译者序	(173)
《异学杂著》序	(187)
《老子臆解》序	(189)
跋旧作版画	(191)
《周天集》译者序	(196)

《佛教密宗真言义释》序·····	(205)
《苏鲁支语录》缀言(附郑振铎序)·····	(222)
《鲁迅珍藏德国近代版画选集》前记·····	(251)
《陆王学述》后序·····	(254)

专 论 篇

韦陀教神坛与大乘菩萨道概观·····	(259)
《唯识二十论》钩沉·····	(287)
关于毗沙门天王等事·····	(307)
梵文研究在欧西·····	(323)
陆王学述(节选)·····	(337)
作者主要著述目录·····	(412)
作者年表·····	(414)

文 论 篇

希腊古典重温

一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成绩。大势所趋，学术似乎是集体化与全球化。东西人士的才智没有优劣之殊，然若干专门研究，我们还是愧不如人，这是事实，然而这是正在过去的事实。

姑举一事为例：我们知道自有历史以后，人类存留了两部最伟大的史诗，在西方流传了三千年。欧洲近代语文多有译本，华文则无。这是一崇高亦又渊深的文化源泉，我们也忽略了，我们如何深透西洋学术思想的背景呢？通常我们钦重西方学术的发展，多只知道现在的成果，而起羡慕，很少注及其产生此果之由来。若稍究其由来，则不但是各个的历史，亦且其整个精神思想之背景宜加探讨。我们期望有一日精工出版一套希腊丛书，中收各种哲学文学等名著的译本。其第一、二部当然是荷马这两大杰作，《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了。

许多世界名著尚没有中文译本，也许将来渐渐会有译本出现的。希腊神话，早已有介绍；哲学，亦有过一些研究、著述。但至今希腊古典，没有在文化界得到适当的处理。因此没有得到正

确的估价，加以应有的推重，大是憾事。现状还是学术风气不甚开通。我们约略知道巴勒斯坦这一文化源流，大有造于西方文化，玛修安诺德称之为“希伯来主义”，没有那，则西洋决不能成就许多伟大事业，随处可以见到的。但我们时常忽略了这希腊文化主流，没有它，则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现代的一切工业、技术、商业、科学的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那么，其重要可想了。而且，甚至还有人假定——在推理上自然有应当容纳的假定——设若世纪初的罗马对基督教的反对更彻底，一切基督教信仰早已断根。则当时希腊文化渐渐陶铸了外邦，其斯多葛学说必支配了统治者，共和政体必已代替了罗马大帝国，奴隶制亦必早已废除。则欧洲在九世纪中必已进步到十九世纪的境况或更前了（此说见 Sir R. W. Livingstone 讲录）。其然，岂其然？

历史的发展未尝如此，基督教的兴起也不是偶然，有其必然之理，学人自可讨论。新旧之兴替随时代之推迁，那结果使人感觉苍茫得很。雅典哲人讲学的檐廊，早已化为尘土，雕花石柱头和柱础，以及出土的一些破缺大理石像，于今散在各处博物院里，竖琴歌声早消歇了，在哲学方面，至少到公元后四世纪，希腊人已完全退出世界剧场。不妨假定那整个文化起始自公元前一千年。譬之于一日，曙光微启，渐次黎明，哲人讲学时代，渐近于日丽中天，光明盛大不过三百多年。残阳之美见于新柏拉图学派之兴起，以后呢？渐渐沦入黑夜了。

这是西方文化的昨日，其光华发越，如何可为后世忽略，遽尔遗忘？我们是神明华胄，所处远在天之一方，未曾参加其文化工事。中国的蚕丝输入古罗马，有一位暴君赫里阿加巴鲁斯（卒于公元后 222 年）最初着一件丝织袍，起初是一两黄金换一两丝织品，后来输往渐多，价低了，做成了元老之流的华服。那只是物质上的一点交易，不算怎样是文化接触，双方古典皆只有稀

微的纪录，彼此略有传闻，中间隔了文化较低的若干民族。造纸、雕版从中国输入，则是中世纪之事。事实上古希腊罗马人决不知道我们，我们的祖先也不知道他们。穆天子之八骏西游纵使不是完全荒诞之故事，则所遇之“西王母”也许是中央亚细亚某部落的女王，决未尝是游到欧洲何处。荷马史诗中记载 Tityus 尸横九亩，与春秋时叔孙得臣射杀的长狄，其大相同，但后者是历史，前者乃神话，时代相距亦远，其间难说有何关系。那么我们看西方，自然不及西方人看自己之亲切、深透，然正因为有距离，时间的和空间的，两个决不可少之“缘”，使我们见物，又或可见其全。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个普通问题：即古不可复。古，无由复，不能复，亦不应当复，人类须是生活在现在而望着将来。但刻刻进步或说转变，现在旋即成为过去，三时一贯，了无间歇。罗马人造扬鲁斯神像，一面正对过去，向后，一面正向未来，向前。我们不正望过去，则无由确立现在，因为将来不可知。不正望将来，则现在已成断灭更无由立。凡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原则是表之于此一象征。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夸张点说，我们是在创造将来，即算模仿过去。但谁也不能在现代创造过去。重生是新生，新生是旧的死掉了，文艺复兴即是重生，复兴是新者兴而旧的废掉了。例如十三、十四世纪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回看是新起一创局，它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它的光明，至少透过它以前一千年。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如此悠远，未尝入于我们之所知。正是这，有待于求知，有待于我们加以研究和采择了。大概无论物质真理或精神真理，总不会有国家或民族或古今之分别。古代希腊的这一大宗学术文化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呢？没有，凡其中摄持了